

大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二十国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进入制定全球经济议题的核心，如何代表广大没有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必须成为这些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重要任务，这也是提升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与影响力的重要条件。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国家，身份最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国发挥发展中国家领袖作用的阻力在逐渐增大。中国发展模式如何发挥示范性效应，能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找到契合点仍有待观察。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未来

袁 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奥巴马上台后，中国曾有三大担心：一是换人，奥巴马团队毕竟与布什团队有重大区别，新团队对华政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二是换党，民主党同时控制府会，对中国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三是换环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切入点势必同以反恐为中心的布什政府有所不同，有哪些不同？基于此，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一开始中国方面是谨慎观望的，尽量压低期望值。

但近一年的实践表明，奥团队对华政策基调之积极、中美关系发展态势之良好，超出了此前预期。中美关系不仅未陷因美政府换届引发颠簸的历史怪圈，反而呈现出异常活跃、积极的新态势：2月，希拉里将东亚作为首访，并将访华作为重中之重，淡化人权宗教摩擦，凸显积极合作意愿；紧接着，杨洁篪外长访美，敲定两国元首会晤事宜；4月1日，胡、奥在伦敦 G20 峰会上实现首次会晤，明确“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新定位，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随后，佩洛西议长访华、吴邦国委员长访美，掀起十几年来两国议会交流新高

潮；此外，骆家辉、朱棣文两位华裔部长联袂访华商谈经贸、能源合作事宜，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美重启中美军事交流大计。其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底成功召开，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引发全球关于“G2”的进一步联想。而多位知名学者、前政要、现官员属意驻华大使一职，最终共和党“明日之星”洪博培“胜出”，亦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两国关系之良好。可以说，奥巴马上台后两国交流时间之频、范围之广、层级之高、内涵之深，不仅在中美关系史上不多见，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也属罕见。11月15至18日奥巴马总统将首访中国，必然会将贯穿2009年的中美互动交流热潮推向顶峰。

其间自然也有一系列不和谐音，包括“无暇号”、“胜利号”事件引发的两国海上摩擦加剧，轮胎特保案显示的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以及双方围绕西藏、新疆问题的矛盾分歧。但总体看，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的大局是稳中有进，小问题小摩擦未能冲淡两国积极合作大势。个中原因，既有中美关系三十年螺旋式上升的累积效应，也是美国面临内忧外困不得不继续强化对华需求的战略使然，同时也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巧实力”战略观与“多伙伴”世界观指导下的对华政策新思维。当然，中国发起对美的“主动外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展望未来，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目前积极合作的态势持续下去，建立起中美真正长期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美关系显然需要冷静评估当前形势，全面把握未来方向。

中美关系三十年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留下一系列难题：两国政治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经济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美国至今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军事安全关系仍远未实现正常化；两国各种对话机制深度广泛展开，但战略互信却仍然不足，彼此猜忌仍很深刻；两国政府关系发展顺畅，但立法机构、地方、非政府组织、民间的沟通与理解仍相对不足；中美围绕台海问题的冲突有所下降，但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的潜在摩擦则在上升。凡此都构成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瓶颈，须要突破。

奥巴马新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也从不同角度给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带来挑战。一是“东移”与“西进”的矛盾，即美国反恐战略重心东移至阿富汗、巴基斯坦，来到中国的近邻，而中国发展重心西进，推进到整个大西北。这种战略推进方向的相向而行没有必然联系，但客观上容易形成某种战略冲撞。西

藏“三一四”事件和新疆“七五”事件的发生，增添了这种矛盾性。二是“登陆”与“下海”的矛盾。美国大举进逼欧亚大陆腹地，继大中亚战略之后，实际上正在推进以“阿-巴反恐战略”为核心的大南亚战略，军事力量全面登陆。相反，中国海军现代化加速推进，准备航母下海、启动亚丁湾护航，呈现出注重海权、进入海洋的态势。南海摩擦近来之频繁发生，不能不说与两国地缘战略的又一迎头相撞有关。三是“救市”与“发展”的矛盾。奥巴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拯救美国经济、拉动美国就业，因此不惜以屈从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推进改革。中国则力保经济发展大局，不容外贸、金融、就业等形势发生逆转。近期轮胎特保案发生，显示两国“内倾化”发展思路无形中构成某种挑战，甚至有可能冲击长期支撑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础。

两国关系的几个结构性矛盾也依然存在，给未来发展投下阴影。其中台湾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相对比较克制，且表现出支持两岸走近的政策意向。但细加分析可见，其对台海两岸走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两岸可以走近，但别谈统一；两岸可以走近，但别妨碍美台走近；两岸可以走近，但美国要有“知情权”。这些条件使得台湾问题仍然存有变数，何况对台军售与美高官访台等敏感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另一可能发酵的问题将是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奥巴马虽表示访华前不见达赖，但同时又暗示访华后必见，看似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实则反映了西藏和达赖问题在美国将长期存在，成为继台湾问题后应对中国崛起的又一张牌。

从未来五至十年这一中长期视角看，中国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的三个不适应，反过来也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从而加深双方的战略冲突。一是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必然会让美国感受到巨大的经济、资源、能源的挑战。二是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也可能给美国带来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挑战。“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之间的柔性较量实际上已经展开，处理不慎，将直接冲击中美关系大局。三是中国作为唯一没有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国的迅速崛起，使美国感到中国以非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概率增高，于是乎给其带来战略与安全上的挑战。

如此看来，奥巴马执政一年来中美关系发展态势之好，决不能成为观察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唯一参照。换言之，不能简单地将目前两国关系的和平稳定视作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战略敏感和深刻的忧患意识，美国常务副

国务卿斯坦伯格才抢在奥巴马访华之前发表涉华重要演讲，提出中美搞“战略保证”的新设想。其根本目的即在于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在两国缺乏战略互信前提下防范未来出现重大风险。其中心思想是，美国及其盟国正式公开接纳中国的崛起，作为条件，中国保证不挑战美核心利益，保证加速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军事透明化，等等。实际上，这是佐利克“利益攸关方”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如果说“利益攸关方”是目的，那么战略上相互保证则是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新时期美国妥善应对中国崛起这一中心任务。

应该说，“战略保证”新思维反映了美国政府旧有对华政策手法的实效，即无论是遏制中国还是融合中国，抑或在中国国内培植一批中产阶级，全都以同美国期待相反的方向发展：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不仅未被美国主导的体系所改造，反而以更加自信的方式深度影响既有国际体系；以俄、日、台为主要抓手来牵制或遏制中国的所谓“离岸制衡”、“大国制衡”战略，也因中俄、中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告失策；至于在中国国内培植中产阶级去推动所谓政治民主，更是一厢情愿——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不仅不是西化中国的力量，反而成了中国政府最大的捍卫者。面对上述事实，同时基于中国崛起不可逆转、中国对美奉行“建设性合作”战略的大判断，奥巴马政府终于不得不通过主动调适来适应中国的和平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保证”实则是愿意同中国各让一步，以类似交易或交底的方式确保中美两国互不挑战对方核心利益，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互相学习、互相帮忙、互相进步”（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语）。借此，中美在新的平台和起点上重新相互适应，实现双边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

这样一种用语未必会出现在奥巴马访华的具体言谈中，但其所透出的重大信息和精神实质，必然会成为新时期两国处理相互关系的一种新尝试。毕竟，中美关系要打破后兴大国必然以非和平方式挑战既有霸权国的历史规律，需要新思维和新行动。